

附录

绿色使者高见邦雄

记一位在黄土高原植树的日本人

《世界知识》记者 葛军

入春以来，华北、东北地区连续十余次强劲沙尘暴天气，使我们似乎一下子对环保的紧迫性有了切肤之感。恰逢此时，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局长高见邦雄于4月9日~28日去山西大同考察，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联络部的协助下，我进行了随行采访。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在北京站大厅并不熙攘的人流中，全国青联的万学军向我介绍了高见邦雄。我近乎诧异和失望地跟他握了握手，接受了他随后递过的一张名片。这就是日本人吗？那种整洁、刻板和谦恭荡然无存，代之以松弛、随意、甚至是不拘小节：蓬松的头发、敞开的领口和外衣，腰包的两根黑色带子随着他走路的节奏不经意地在身后摆动着。

火车刚启动，他便迫不及待地从背包里取出一瓶英国威士忌和几个纸杯，礼让一圈之后，他就边喝边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

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再没有比这样的开场白更让我处境尴尬的了，我暗自庆幸没有提出常规思维下的问题。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不是我自己要来了，是他们（他用手指着随行的全国青联干部）把我‘骗’来的”。

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汤本渊介绍说，“绿色地球网络”是一个由日本发起的非营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以日本会员为主，也有少数韩国、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会员。会员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家庭主妇，也有科技专家和商界人士。该组织的宗旨是“环境无国界”，实现超越国界的民众合作，共同保护地球环境。该组织目前有 500 多名会员，总部设在大阪。

玩笑归玩笑，其实日方选择黄土高原并非毫无科学论证。从 90 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遭到“泥雨”的侵袭，风沙天气日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本国国内的生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环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 900~1500 米之间，年降水量为 380~460 毫米，无霜期为 90~130 天，干旱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同时，大同地区属于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绿色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从 1992 年以来，全国青联和山西省青联委托大同市青联与“绿色地球网络”合作，开展了以日方捐助资金、我方组织实施的方式，共同营造“黄土高原地球环境林”及“桑干河青年工程林”的活动。截至 1999 年 5 月，日方累计提供绿化资金 1000 余万元人民币，共植

树造林 2560 公顷，接待日本黄土高原绿化协力团成员 700 多人。1995 年 8 月，成立了由日方投资、大同团市委管理的“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

“中国有句谚语：万事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理。种很容易，但能否成活就不好说了。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其二，社会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和个人的交际能力；其三，人的因素。”

作为“绿色地球网络”的创始人之一，高见邦雄似乎与中国有一种不解的情缘。他早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现年 52 岁。1971 年首次来中国，参观考察了大寨。当我问及他当时的感受时，他说：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但随后我觉得，大寨人造梯田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许，他创办“绿色地球网络”的设想便发端于这样的思考。

从 1991 年底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一起，从事植物的试验、育种、推广及相关工作。他跑遍了大同的村村寨寨，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绿化方案。难怪老乡们亲切地称他为“高见”、“老高”。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听懂连北京人都很难听懂的大同乡下话，而且还能说上两句“知不道”“么”，他也不无夸耀地自称“四分之一个大同人”。

谈起种树的感受和经历，高见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谚语：万事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理。”据高见自己说，在中

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更令他不解和气愤的是，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借以维持生计的耕地。其实，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何以理解和顾及环保问题呢？“我犯了官僚主义。”他笑着对我说，这个很中国化的词让他用得很到位。

后来，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一是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1998年，他在日本募集了约合20多万人民币的资金，为广灵县苑西庄村打出了第一口井，结束了全村200多户人家走20多里路肩挑手抬的吃水历史。二是营造经济林。1994年和1995年共投资23万余元人民币种植了9000余亩仁用杏，去年收入50多万元，估计今年将达100余万元。此举最大的收益是使农民看到了“退耕还林”的直接经济利益，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种树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三是与希望工程挂钩，共同为贫困山区的小学营造“希望果园”。因为他意识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脱贫要靠人才，植树也要靠人才。

我们的汽车卷着一路黄尘来到苑西庄村的井边，我看到了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红漆描摹的大字——“吃水不忘打井人”。当四周的尘埃落定，我惊奇地发现，井四周齐腰高的围墙外，已静静地围上了20多个老乡。高见走上前去隔墙和他们互相拍拍肩膀、握握手，平静、自然，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是一双双因辛勤劳作而异常粗糙的手，是岁月沧桑留下一道道洗不去的泥土痕迹的手，干枯、布满皱纹……就是这样的手与高见的手握在一起，久久地握着。他们一起抽着黄土高原产的香烟，披挂一身永远也掸不净的黄土。如果不是那架已经磨得发白的尼康相机和一双已被黄土遮盖了本色的深色旅游

鞋，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是日本人。

临别，一个老乡说：“高见，上家喝口水，歇歇。”高见说：“下次，我住这儿，咱们喝酒。”于是，我感悟了，感悟到他们之间不用太多的语言就能彼此沟通的那份真情。

“我一直都在失败，我很少成功。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原因有二：有一种人放弃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可我没有，我只有这一种事业；另一种人是承认失败了，而我不承认我最终的失败。”

当初，“绿色地球网络”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共有 5 人，其他 4 人都认为在大同植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最终放弃了，只有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我随口问了句“”为什么？”高见轻描淡写地说：“我傻，我太傻。”

其实，“太傻”的不止他一个。据说高见的妻子也在“绿色地球网络”大阪总部工作，也曾来过大同植树，不知她看到黄土高原的穷山恶水有何感受。不过，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肯定与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虽然这种支持更多的是“排忧解难”而非“享受成功”。

高见曾告诉我：“我的同事们说，我妻子有 3 个孩子，我是老大。”从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中我听出了很多隐情。从日本到中国的偏僻山村，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生活都存在着极大反差。他不仅要迎接恶劣生活条件的挑战，还要忍受精神生活的匮乏，克服语言交流的障碍，最为严重的是要面对因水土不服而枯死的树苗。但高见最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不是应了西方的谚语：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据说，有时他很少吃饭，只喝些啤酒或自带的威士忌，吃些绿

菜。

高见是一个平凡的人，偶而，他也会发发牢骚，说说自己的苦衷：

“我不怕自然条件的艰苦，我能吃苦，可我怕人的因素。这个县委书记很支持我，鼓励我多种树。我刚种好树，县领导又换了，新书记不热心植树，于是树就一点点地死去。有很多官僚主义的做法，比如，提倡种万亩林，搞隆重的仪式，两年过去了，热乎劲儿没有了，林子荒了，只剩下一块‘万亩林’的牌子……”

“我感到最苦恼的还是资金问题，现在‘小渊基金’还没申请下来，就是申请下来也太少；而原来的资助方日本环境厅和邮政省听说我们申请了‘小渊基金’，便都停止了资助。”

高见有着务实的态度、勤勉的作风和执着的精神。他说：“我在播种树木，树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希望，所以我是在黄土高原播种希望。”正因为如此，他说：“我已经欲罢不能。”

最初，也许是高见对环境的关切打动了日本的志愿者，使他们自费来到中国的穷山僻壤植树造林，而现在不也正是志愿者们对全球环境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和深切忧虑在激励着高见吗？就让我用日本志愿者来中国植树后的感受结束本篇采访吧。

“日本一张电话磁卡的钱在中国能买3棵树苗，每棵树苗的成本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

“我深感一元钱、一滴水、一棵树的重要。我们追求富裕生活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次活动让我们收获很多……”

“生活在发达国家里，我们使用了很多能源，排出了许多废物，对环境是有责任的。”

“21世纪不能回避环保与南北差异问题，中国环境的真正受益者是日本人。”

——原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10期）